



唐至五代釉陶佛像模型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该遗址位于东风西路南侧，于2022年6月—11月，2024年11月—2025年1月，配合医院建设，先后进行两期考古发掘，共发掘面积约2150平方米，清理出西汉南越国至明清时期排水沟、水井、灰坑、灰沟、城壕护堤、埠头以及墓葬等各类遗迹多处。南越国陶管排水沟，让我们从营造见等级；唐五代贝壳堆积沟，或印证临海资源的利用；宋代垫土1米的垫土层，作用为何，引人遐想；明清石砌护堤与光绪年埠头遗存，勾勒出水岸治理的一些脉络。而从西汉跨越至唐的60余座墓葬及大量建筑构件出土，勾勒广州古城西北郊千年人居“生活”与“墓葬”交替折叠的重要窗口。

西汉南越国时期排水沟：发现两条。其一位于发掘区中东部，整体为西南—东北向，平面呈长条形，口大底小，斜壁内收，底部较平。揭露长29.5米。沟内西南段埋置陶管道，残长11.2米，陶管道为圆形，每截长约0.55米、直径0.2米，两两扣接而成，表面饰绳纹。其二位于发掘区西部，近南北向。平面为长条形，断面为“凹”字形，直壁、平底。残长5.79米。沟内置陶管道，由多个绳纹黄陶、灰陶半圆形筒瓦两两相扣而成。

唐至五代时期贝壳堆积灰沟：东西向，西高东低，北部边线较整齐，呈直线状，南部边线中间区域为不规则形状向外凸，呈曲线状，斜边向下内收，弧底。揭露长53.4米、宽2.6—5.6米。沟内中东部有大量白色圆形海月贝壳堆积，灰壳堆积局部向南北凸。贝壳表面光滑、扁平，应经过人为加工，

想象一下，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着宏伟的建筑、热闹的码头、繁华的集市。而如今，现代化医院大楼即将拔地而起。考古，一场过去与现在的对话。追问，把生死折叠的丰富历史场景缓缓打开。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一医院”）位于广州城区西北部，东、北、西分别与盘福路、东风西路、人民北路相邻；南隔彭家巷与千年古刹光孝寺共享晨昏。为配合市一医院改扩建项目，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于2014年、2022年及最近的2024年—2025年开展了三期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大量遗迹和文物，为廓清自西汉南越国以来广州古城西北郊的社会发展历史沿革、北宋至明清广州城“北城墙”西段的建设与变迁，以及古城地形地貌和水系变化等提供了珍贵实证，对研究广州历史地理产生重要意义。

□ 覃杰



西汉南越国时期排水沟及陶管道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初步认识

综上所述，市一医院发现的文化遗存具有年代跨度大、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的特点，通过梳理历年周边考古成果及历史地理环境，结合文献，初步有以下几点认识：

从前有“高岗”，岗北有“兰湖”

高岗遗址位置是一个小山岗。清代《南海县志》所刊《县志附省全图》，市一医院东风西路南侧用地附近历史上曾存一处“高岗医灵庙”，结合古舆图、文献与考古成果，发掘区域应是名为“高岗”的小山岗。山岗距离唐五代以前广州古城约2公里。

文献记载，秦汉时期广州城西北部为大面积水域。历年在东风西路以北考古发现的水相淤积泥层也证实这一点。这片水域应是兰湖，兰湖在历史文献中有诸多提及，最早可见南朝《南越志》记载：“番禺县北有三湖，一曰沉夜（湖），二曰菰湖，三曰芝兰湖。”芝兰湖便是兰湖别称。兰湖三面环岗，东为象岗，南为西山，西接司马涌，北为桂花岗、蛇栏岗、陈岗。西山上有西山庙（大致在现今西山庙前一街广州能源检验研究院位置）。西山往东即为高岗。高岗北侧旁为兰湖。

千年兰湖津，蕃舶云集处

兰湖作为广州唯一的天然湖泊，湖阔水深，与珠江干流相通并注入南海。走水路交通南来北往的船舶，可能早在汉代就已进出兰湖，把其作为商贸中转站停泊点、码头及避风港等。唐代广州作为“万里通海夷道”起点，兰湖码头成为北江、西江主要停泊点。元《大德南海志》记载兰湖（芝兰湖）为广州城西船只停泊处，湖面宽阔，可避风浪，是内河航运的中转站。其“周围二十余里”，湖畔设码头供商船装卸货物。南宋《方輿胜览》载“兰湖通舟楫，商贾云集”。明代《广州府志》记载兰湖“南通珠江，北接流溪”，湖畔码头为唐宋时期蕃商（外国商人）停泊点之一。在宋代还是广州城西北的船舶避风港，“凡使客舟楫避风雨皆泊此”。文献给我们描述了码头停靠大量商船装卸货物，南来北往商贾云集，人群中还有阿拉伯、波斯等外国商人的一幅热闹繁荣景象。

唐前陆路通，水涨隔六格

高岗傍着兰湖，地理位置优越，因此给我们留下许多重要发现。发掘区东部地表往下清理现代层、宋代垫土层，垫土层下发现砖构水井和灶，往下约2米为北宋至唐五代时期地层水相淤积层，再往下发现南朝晚至隋唐时期墓葬，墓葬打破南朝冲积土土层，南朝地层下是水洼地淤积层，再往下距地表约4米的生土面发现一眼南越国时期土井。根据这些地层堆积情况和遗迹现象，结合宋明城墙所在地不是山岗或台地，而是较低洼地势，城墙修筑以前的地面距地表超过6米，因此推测在西汉南越国时高岗靠水的边缘位置至少还要往东风西路北部（走），兰湖当时水面还要低于现地表4米以下，直到唐代后期由于长年淤积，湖底渐高，水面上涨，兰湖水域才进入遗址区向南延伸至西濠（宋代护城河）位置。因而，在唐中期以前高岗有可能大致向南方方向与六榕寺位置存在陆路通道，进而推测广州古城陆地延伸最西北区域，应该是高岗。据前所述，历史发展到唐五代时期，高岗地理环境已发生变化，随着兰湖水面上涨，湖水沿

结语

自1953年以来，广州在配合城市建设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发现许多重要的古遗址、古墓葬，如秦代造船遗址、南越王墓、广州汉墓群等。1982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强调基建工程建设须向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报建。但具体到广州的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加快，有关建设方往往是没有报建或是在施工后才报建，进而文物被破坏损毁，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2013年5月1日，《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规定》施行，明确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前需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开创全国“考古前置”地方立法先河。随后配套出台《广州市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办法》《广州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形成“先考古、后出让”的完整制度体系。鉴于这些法规、文件的实施，按照考古前

千年古墓诉城史：汉代番禺的生死印记

□ 霍雨丰

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内，看着近在咫尺的文物，读着50多年前的一封信，思绪已飞跃到两千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

汉代的番禺城，是司马迁笔下著名秦汉都会之一，也是帝国南缘最独特的城市，秦文化、汉文化、楚文化、越文化等多元文化在此碰撞，形成独特发展轨迹。时光荏苒，有赖于考古工作者的发现，广州汉代考古成果极为丰硕，宫殿、苑囿、王墓、水井，还有上千座臣民墓葬，织就两千年前生活图景。



先烈路下二望岗出土的玉雕熊形饰件

广州博物馆供图

从麦英豪先生的一封信说起

1973年2月25日，麦英豪先生写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的一封信，提到他最近考古发掘的广州淘金坑西汉墓群：“今年一月十日转到北郊淘金坑32层宾馆工地配合平土工程，发掘了一处南越王国时期中小官吏墓葬群……廿一座都是西汉初年的，从钻探已知还有几座未掘。这处墓群分布比华侨新村尤为密集……反映了这处葬地自南越赵氏王国衰亡之后经两汉几百年还是保存较好的，直到晋以后才有人敢在这里占地而葬，这个情况正与华侨新村西汉墓群是一个样，在广州还是第二次见到年代这样划一的一处墓群。”这封珍贵通信收录在《苏秉琦往来书信集》（刘瑞编著，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21年12月），现藏中国考古博物馆。

麦英豪先生是广州考古的核心人物，信中提到的华侨新村西汉墓群、淘金坑西汉墓群，均是由他主持发掘，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广州重要的城市考古成果，其中1953年至1960年间考古发现的包括华侨新村西汉墓群在内的409座汉墓，收录在《广州汉墓》一书，该书不仅是广州第一本田野考古发掘专刊，更是岭南考古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里面所涉及墓葬点多达80余处，遍布广州东南西北，它们不仅是两千年前番禺城臣民生活的点滴所在，也是两汉时期400年间城市发展轨迹的直观反映。

番禺城东北郊：排列有序的南越国贵族墓群

以南越国宫署为中心的番禺城，周长约十里，城南外是宽阔珠江，西、北、东边则尽是岗峦起伏之地，除了修建城外基础设施之外，其次葬在岗腰，最低级者则在岗脚，体现尊卑有别。蚝壳岗整体级别略低，随葬品大多是以陶鼎、陶壶为主的陶器组合，且多随葬铜镜，属于中原文化较为显著的群体，墓葬分布均匀，未呈现十分明显的阶级等级区别，很可能是其中一位墓主“得之”的家族墓地。相比之下，竹园岗级别最高，位于岗顶处的墓主名“李嘉”，其余墓葬均在岗腰环绕之，李嘉墓出土器物极为丰富，仅陶器就多达百余件，还有铜器、铁器、玉器，也是竹园岗级别最高的墓葬，也是华侨新村一带级别最高者。

邻近的淘金坑一带，应是南越国一般官吏及臣民墓葬群，整体级别较低，随葬品多以陶器为主，只有零星铜器、玉器、铁器等，但一些墓也有印章随葬，让我们知道这些官吏的名字有赵望之、郑末、孙熹等。2013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淘金坑北侧的畔山豪庭工地又发现一些南越国墓葬，级别相若，应同属该墓地。

横枝岗：广州延续时间最长的墓地之一

横枝岗位于番禺城东北郊偏东，这片区域地势较高，周边是连片山岗，加之离城市中心距离适中，此处发现自汉至清的历代墓葬，是广州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墓地之一。该墓地不见西汉南越国时期墓，应是汉武帝平南越后，西汉中晚期番禺臣民新规划的一个墓葬群，并未为后世所沿用。现发现以横枝岗为中心的泛横枝岗墓群面积很大，西汉中晚期的墓葬群集中在原横枝岗本体（约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及邻近的今广州疗养院、今广州市胸科医院一带。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遣五路大军平定南越国。战争后番禺城满目疮痍，幸存的百姓和南下的中原汉人组建成番禺城

新的臣民，他们筚路蓝缕，在废墟中重建家园。横枝岗汉墓是广州西汉中晚期汉墓的代表，随葬品多为中原风格的汉式陶器，说明臣民生活已明显受中原文化影响。横枝岗墓地还出现一种新的葬俗，即以石璧和铜镜为组合，或置于头端，或置于脚端。

横枝岗墓地有一座名为“癭顺意”的墓，出土铜镜、眉笔、珠饰等器，是广州考古发现规格最高的西汉中期墓葬之一。汉武帝时期，广州已是国内贸易中心和海外进口货物集散地，大量本地特产和海外舶来品在此汇集，还有大量商贾来往，墓中随葬珠饰表明，癭顺意应是这一时期的新兴贵族。

见证两千年前“河南”的开发

两千年前珠江河面宽阔，番禺城民主要生活在“河北”一带，“河南”一带整体地势较低。卓雅雄老师在《广州历史地理拾零》一书中对南越国时期水陆状况进行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河南”大多为滩涂之地，不宜居住生活。西汉初期“河南”仅在今市二官小港路一带发现有零星墓葬遗迹。到了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随着珠江水平面下降等地理环境因素的改变，加上人口增加和舟楫的发达，番禺民活动范围向南扩展，在今海珠区的小港路、前进路、晓港、康乐村、南石头一带发现的墓葬越来越多，见证了带两千年前“河南”的开发。

在小港路元岗发现的一座西汉晚期墓，一件陶盖刻划“杨本”二字，很可能是墓主姓名，这是迄今广州汉墓中最早可姓名的“河南”居民。而在晓港细岗发现的一座穹窿顶合券顶砖室墓，年代为东汉后期，墓葬虽被盗，但出土多件陶器上均刻有“梁国雄”

（本文作者是广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